

阶级的代际变奏：“新东北文学” 中的转型记忆与阶级经验

社会
2025·6
CJS
第45卷

谢 雯

摘 要：“新东北文学”揭示了“东北问题”背后历史经验与转型记忆的深层面向，已成为理解中国转型期知识生产的重要文化现象。本文以文学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新东北文学的社会意涵，揭示其与转型期主体精神世界之间的关联。本文指出，新东北文学中的阶级经验书写，正是其能够超越地域限制并引发广泛共鸣的核心所在。这种书写并非仅限于工人家庭内部“子一代”对“父一代”尊严的重建，而是在阶级话语重构的转型语境中，加入当代阶级经验的再表述与再感知，进而激发出一种以阶级变动、焦虑与不确定性为核心的跨代际的情感共鸣。本文由此揭示文学在社会转型中建构集体记忆、引发公共反思的功能，以及转型期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对自我价值与认同的多重探索。

关键词：文学社会学 新东北文学 社会转型 记忆 阶级 代际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25.06.001

Intergenerational Resonances of Class: Transitional Memory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ew Northeast Literature”

XIE Wen

Abstract: “New Northeast Literature” has revealed the profound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ransitional memory underlying the so-called “Northeast problem”, emerging as a vital cultural lens for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al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New Northeast Literature from a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perspective, uncovering its connection to the subjective world of individuals navigating social transition. It argues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class experiences constitutes the core through which

* 作者：谢 雯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XIE W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wxie@pku.edu.cn

本文初稿及部分内容曾在2024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历史社会学分论坛、第十三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以及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作报告。感谢渠敬东、宋念申、田耕、陈颀、狄金华、刘子曦、邓燕华、王利兵、阿拉坦、李瑞彤、吴柳财、张婧、刘岩、王洪喆等师友及《社会》匿名审稿人在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与启发性建议。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transcends its regional origins and evokes broad social resonance. Such representations go beyond the restoration of dignity of the “father’s generation” by the “son’s generation” within working-class families. Rather, they re-articulate and re-perceive class experience within the shifting discourse of class, sparking intergenerational affective resonance around themes of class mobility, anxiety, and uncertainty. Drawing on their own life upbringing experience, the writers born in the 1980s translate familial memories of class experience into tangible literary language, transforming personal trauma into an embrace of working-class ethics and a nostalgic yet distanced reminisc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idealism. As contemporary youth confront the anxiety arising from class solidification and unstable class identity, they find an implicit yet pervasive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 the “class faller” figures depicted in New Northeast Literature—a resonance deeply rooted in their lived experience of accelerate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loosening of identity hierarchies. Ultimately, the paper reveals literature’s role as a medium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public reflection in times of social transition, underscoring the multifaceted ways individuals navigate self-worth and identity amid structural uncertainty.

Keywords: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New Northeast Literature, social transition, memory, class, generation

一、引言

2015年,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问世,以冷峻而凝练的叙事风格揭示了东北城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隐秘伤痛。作品甫一发表,便引发学界与公众的广泛关注,被评论界视为“新美学原则的崛起”(黄平,2017),双雪涛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最被看好的小说家之一”(王德威,2019:35)。此后,同样来自沈阳的班宇与郑执相继崭露头角,与双雪涛并称“铁西三剑客”。他们以独特的叙事视角描绘东北在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中的矛盾与失落,通过细腻的书写揭示普通人在结构性转型中的情感挣扎。作为当代文学版图中的新兴力量,“新东北作家群”的出现不仅扩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疆域,也促使文学界重新审视“东北书写”的潜能(丛治辰,2020a;王德威,2021;刘岩,2024)。自2015年至今,这一文学现象已持续近十年,其社会反响早已超出文学领域,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入点,并由此进入社会学的分析视野。

这一文学现象的兴起揭示了“东北问题”的另一面向。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界对东北的研究多集中于国企改革与单位制解体所引发的就业体系转轨、社会保障制度重构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等议题,将东北视为陷入经济低迷与制度困境的典型案例(林毅夫、付才辉,2017;田毅鹏、康雯嘉,2019;高柏,2021;谢雯,2019,2024)。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东北问题”主要被理解为发展与转型的问题。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东北再次成为公共议题讨论的焦点,其复杂性已超越产业升级与市场化受阻的经济层面,扩展至涉及历史遗产、集体记忆与情感结构的文化领域。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叙事中,东北被赋予了独特的社会时空意涵,这使得“东北”不再仅是一个关乎地方发展与产业转型的区域性议题,而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文化符号。个体通过不断地讲述与阅读“东北”,在此过程中重新理解转型的历史,也在反思性的回望中把握自身及当下。在此意义上,社会转型并未被封存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持续渗入人们的叙事与回忆之中。质言之,“东北问题”的内在逻辑,实则指向历史经验与社会记忆相互建构、彼此形塑的动态过程。就此而言,“新东北文学”的兴起绝非单纯的文学现象,更在文化表征层面为社会学提供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独特切入点,其生成与传播本身亦成为转型中国社会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

“新东北文学”¹具有两个值得社会学关注的显著特征。其一,这一文学潮流的创作主体并非直接经历工厂生活的一代人,而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生活轨迹已脱离传统工业单位体制的“80后”作家。这一代际差异本身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为何正是这一代,而非亲历工厂转型的上一代,成为重新讲述东北经验的主体?其二,“新东北文学”在描绘工人下岗、社会秩序瓦解、家庭解体与代际疏离等经验时,虽深植于东北的历史语境,却能超越地域界限,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这种超越地域的公共性也引出进一步的问题:为何一种明显具有地域性的文学书写,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其社会感染力从何而来?

1. 文学研究领域常使用“新东北作家群”指代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东北年轻一代作家,这里的“新”是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而言,即左翼现实主义流派,包括萧红、萧军、舒群等人。本文更多使用“新东北文学”一词,是因为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并不都以东北为直接书写对象,本文更强调其创作中根植于东北经验与背景的文本书写。此外,本研究在考察作家群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文学文本及传播实践纳入分析视野。

现有文学研究多将“新东北文学”理解为工人阶级家庭中“子一代”对“父一代”命运的回望与尊严修复(丛治辰, 2020b; 黄平, 2020), 强调代际情感延续与尊严重建。这一视角确实揭示了系列作品的重要主题, 但若始终囿于“子一代”与“父一代”的工人阶级家庭内部叙事展开解读, 可能会低估这些文本所折射的深层社会意涵, 遮蔽其背后所蕴含的转型社会中制度断裂与社会重组的结构性张力。事实上, “80后”作家对工人阶级历史的文学回溯并不是单纯的历史追忆, 而是植根于自身浸润其间的转型社会成长经历, 通过将父辈经验与自身的时代处境并置参照, 完成了对历史经验的再诠释与意义重组。换言之, 这一代作家的文学实践本质上构成了一种“代际转译”的文化过程, 其中折射出个体与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复杂的深层纠缠与持续互动。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代作家的书写在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 激发出了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这一传播效应表明, “新东北文学”中工人家庭的叙事已然突破特定区域家庭经验的阈限, 转而成捕捉转型期社会心态流变的关键文化中介。在这一意义上, 家庭不仅是私人记忆的载体, 更可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缩影与社会变迁的传感器(参见阿斯曼, 2017; 刘亚秋, 2021; Walley, 2013)。家庭叙事中涌动的代际互动与情感传递, 在个体生命史与社会历史之间搭建起一条可阐释的认知通道, 而正是这一从个体/家庭到社会的通道, 构成了社会学切入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分析时不可或缺的核心研究对象。

本文认为, “新东北文学”中的阶级经验书写, 正是其能够超越地域界限并引发广泛共鸣的核心所在。这种书写并非仅限于工人家庭内部“子一代”对“父一代”尊严的重建, 而是在阶级话语重构的转型语境中, 加入当代阶级经验的再表述与再感知, 进而激发出一种以阶级变动、焦虑与不确定性为核心的跨代际的情感共鸣。通过代际叙事与情感表达, “新东北文学”将转型社会中原本难以直接言说的阶级跌落、阶级转换与阶级焦虑, 转化为可感知、可叙述、可共享的意义结构。这一文化性的转译, 不仅重新唤起了转型社会中被遮蔽的阶级经验, 也为勾勒阶级作为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y)的历史轮廓提供了独特视角。本文借鉴“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对文化在社会实践中构成性作用的强调(Adams, *et al.*, 2005),²将“阶级”视为一种需要被历史化地理解的社会范畴, 重

2. 与早期历史社会学强调国家形成、战争与革命等宏大历史过程, 或聚焦制(转下页)

点关注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如何被表述、体验与象征，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成特定的情感结构与身份认同。

在现当代中国，阶级的形成与运作具有高度的历史复杂性，其生成过程并未遵循资本主义社会渐进演化的逻辑展开，而是深嵌于革命动员、体制重构与政策转向所构成的剧烈变动的历史进程之中。与布迪厄等理论家所阐述的西方阶级理论相比，中国的阶级建构缺乏长期稳定的工业社会基础，也未依托代际积累形成相对固定的品位、生活方式与文化区隔。相反，中国的阶级结构及其认知体系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革命、计划经济及快速市场化的连续冲击，其历史节奏与制度逻辑共同决定了阶级范畴的高度政治化、结构流动性与认知复杂性。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阶级经验主要由国家在特定政治语境下有机构造，形成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化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发展重心的经济化转向，这一体系逐渐解体，新的市场化分层逻辑取而代之。“中产阶级”被塑造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意象，并与“橄榄型社会”的愿景相关联，象征着稳定、秩序与消费现代性的未来图景。然而，政治化阶级的历史遗产并未随着市场化推进而彻底消散。革命时期形成的阶级记忆与身份经验仍镌刻于个体生命史与集体记忆中，持续构成尊严感与社会认同的重要来源；市场化的阶级话语虽倾向于以去政治化的“阶层”概念替代“阶级”，但社会分化的感知与表达并未由此消解。在日常生活与公共话语中，“阶级”依然作为一种情感化的社会范畴顽强存在。由此，当代中国的“阶级”呈现独特的双重性：在官方话语中被有意淡化，却在个体经验、代际记忆以及现实社会关系中持续被召唤，并在继承与替代的张力中塑造着人们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以及意义世界的结构。

在这一意义上，“新东北文学”揭示了转型语境下两套阶级话语的交织与博弈，并由此塑造了个体生命体验与集体历史记忆。这一文化现象虽生发于特定区域，却不仅回应地方经济与社会困境，更通过能动的文学实践承载对历史经验的追忆与反思，同时指向更为宏阔的结构性议题。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语境中，文学如何作

（接上页）度路径与比较分析逻辑不同，“第三波”历史社会学更关注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构成性作用，强调象征实践、范畴化过程与主观经验的历史生成，并积极吸收借鉴解释学、符号学与文本分析等人文学科资源，建构起一种更具反思性和包容性的历史社会学视野。

为一种历史经验的存储与再生产机制,介入转型期阶级经验的重新表述与记忆形塑进程,进而参与阶级意识的重构,并影响转型期个体的精神世界与集体心态的生成。

本文的分析路径可纳入文学社会学的范围。长期以来,社会学界持续关注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及其社会功能(肖瑛、孙绍文,2017;郑少雄,2018;凌鹏、孟奇,2023)。文学除了具备审美价值之外,更构成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机制,其叙事结构与感性语言能够细腻地描摹个体经验,揭示意义秩序,进而在理解社会现实方面展现出与社会科学研究相当的洞见(Abbott,2007;方维规,2011;刘亚秋,2019)。然而,文学社会学的发展始终面临学科边界与方法论平衡的挑战:如何在引入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的同时,保持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开放性,一直是理论与实践共同探索的核心问题(肖瑛,2019)。在此背景下,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分析路径加以说明。

本文并非停留在纯文本分析之上,而是关注文学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实践,如何介入对历史经验的重组,并成为理解自我与世界的重要认知框架。正如詹姆逊(Jameson,1981)所指出的,文学叙事往往是对历史矛盾的“政治无意识”的表达,其象征结构构成了对社会矛盾的间接回应,为那些无法被直接言说或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文化层面的“解决”方案。瓦尼亚(Vaña,2020)进一步将小说创作视为一种理论化的实践,认为作家通过对个人经验的细致描摹,将碎片化的生活素材编织成超越具体情境的“意义景观”(landscape of meaning),从而揭示社会整体的深层结构,呈现跨越时空的心态史与精神史节点。作家的书写既回应过往经验,也参与对当下历史的再叙述;文本进入公共领域后,又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被不断解读与再生产。阅读因此成为一种双向的意义建构:文本通过隐喻、节奏与叙事策略引导读者进入特定的社会认知秩序,读者则以自身的文化资源生成新的理解,使文学成为个人经验、历史叙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中介(Griswold,1993;Olave,2018;Vaña,2020)。

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本文采用一种“内外结合、往复穿行”的研究路径,构建“创作—文本—接受”的循环分析框架,探讨“新东北文学”如何在社会转型中成为个体经验、历史叙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性实践。首先,从作家的生命史与社会经历入手,考察其创作动因与历史感知,揭示文学书写如何回应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变动之间的张力;继

而,进入文本内部,分析其叙事结构、语言风格与人物塑造,特别关注家庭叙事如何折射阶级流动、身份变迁与转型期的不确定性;最后,将作品置于传播与接受的网络中,包括出版实践、媒体评论与读者反馈,以揭示其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中所引发的情感共鸣。该路径强调文本内部结构与外部语境的交互作用,既避免将文学作品简化为社会现实的直接再现,也防止在纯文学的自足逻辑中隔绝其社会性。

“新东北文学”的特殊处境为这一分析路径提供了理论上的必要性与经验上的可能性。这一系列文学作品既未稳固进入“经典”序列,又难以纳入通俗文学的消费逻辑,而是处于“未经典化”与“非流行化”的中间地带。它在学术界与公共舆论场域持续引发讨论,却保持着开放与未定型的状态。这一“中间地带”使研究者得以摆脱经典化的期待,避免过早的框定式阐释,也避免将其简单视作即时流行或市场驱动的情绪再现。正是在这种生成性状态中,这一系列作品展现出文学与社会转型之关系的独特质感,使研究得以在文本细读与社会解释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

文学叙事和情感表达固然可能与历史“真实”存在距离,但正是在这种张力中,部分作品呈现出社会学意义上的独特价值。文学通过叙事策略的选择、情感逻辑的组织与记忆图景的建构,捕捉并呈现那些个体乃至集体难以言明的经验,进而重构个体生命历程与宏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再现”现实,而在于它如何借助审美形式与叙事机制,生成能够引发共鸣的意义结构。基于这一理解,本文并不试图以文学材料来验证历史事实,而是致力于探讨文本如何借助叙事、象征与情感机制,重塑社会变迁的意义秩序,进而透视转型期个体的精神世界与社会心态的生成过程。

二、“下岗家庭的孩子”

社会理论家往往依赖分期概念来把握社会变迁,这种以时间为轴的历史化分析可追溯到经典社会学的源头。滕尼斯对比共同体与社会,涂尔干区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马克思论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韦伯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转变。这类现代转型的二元理论往往通过将“前现代”与“现代”、“过去”与“当下”简化为对立两极,构建出一种线性的进步时间叙事(Inglis, 2014)。在教育与知识生产的过程中,这种时期化的逻辑不断被强化,使人们习惯于将当下视为与

过去的质性断裂 (Bendix, 1967)。当这一逻辑与发展主义相结合时,更被转译为一种空间秩序:自认为处于“更高阶段”的地区,将其他地方视作“落后”与“不现代”的他者,进而在现代化叙事中将其置于“有待改造”的位置(参见 McClelland, 1961; Ferguson, 1999)。

这种线性、进步的时间观也深刻影响了学界与公众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普遍被视为从“传统”计划经济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这一进步主义的假设在无形中规定了何种制度与文化应当被淘汰,从而在价值层面构筑了改革的方向感与合法性。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东北经验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改革话语长期聚焦江浙、闽粤等沿海地区,东北则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共和国长子”,逐渐被塑造为市场化进程中的“滞后者”,成为现代化二元叙事中“停滞”与“衰老”的象征。在此背景下,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既失去了经济与制度层面的保障,也在公共话语中逐渐被抹除,失去了作为历史主体的叙述权。主流媒体在重塑改革年代的价值体系时,更倾向于强调“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将再就业的困境归咎于失业者自身的“素质不足”“观念落后”或“技能缺乏”,而往往忽视社会保障体系转型滞后等更为结构性问题(戴锦华, 1999: 277)。在大众文化的镜像中,他们被描绘为“落伍者”与“失败者”,被污名化为依赖、懒惰、缺乏竞争意识或思想保守者,其社会地位与个人尊严在双重层面上遭到剥夺。东北也由此被整体“他者化”,成为改革叙事中不可见的阴影地带,而下岗工人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历史主体性则被长期压抑与遮蔽。

然而,当我们把多代际的家庭经验与亲历者的生命史纳入考察视野时,这种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转型叙事与真实社会经验之间的错位便愈发凸显。“新东北文学”的三位代表性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皆在家庭层面经历了大规模下岗所带来的动荡与重组,他们可谓“下岗家庭的孩子们”。下岗不仅冲击了家庭的经济基础,更在情感与心理层面留下了深刻印记,塑造了一代人的集体感知。亚历山大 (Jeffery Alexander) 指出,当一个群体意识到共同经历的破坏性事件对其集体认同造成不可逆的改变时,文化创伤 (cultural trauma) 便由此生成 (Alexander, 2004: 1)。班宇曾回忆,2000年春节的家族聚会中,他忽然意识到十几口人中“只有父亲仍有正式收入”。这一发现令当时十四岁的他第一次感受到深切的忧虑。升学压力之外,是补课费、择校费等现实

负担，下岗家庭虽竭力维持平静，他依然“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³这种持续的心理紧张与情感压抑，并未在当下以政治语言表达，而是在多年之后经由文学的形式逐渐转化为一种可被感知、可被共享的情感结构。记忆的裂缝往往即是创伤的疤痕，它抗拒即时的言说，只能在深度破坏性事件发生许久之后，在文学的框架中获得一种延迟的呈现（阿斯曼，2021：135）。⁴班宇也曾坦言，写作之于他更像是“还贷款”，父母从企业的辉煌到“双下岗”的经历始终是他内心的负担，他“要通过写作把它给卸掉，或是刻写在更深处”。⁵

尽管双雪涛、班宇与郑执（分别出生于1983、1986、1987年）彼此并无私交，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以东北为背景，围绕衰败、失落与家庭裂痕进行文学书写。这种表面的巧合实则揭示了创作背后的代际结构逻辑：他们不曾主动“选择”相似题材，而是在相近的历史节奏中，被类似的社会经验“召唤”出来。这种代际共振根植于在相同时代条件下个体对现实的情感回响与经验回应，是历史时间与生命时间交织的产物。⁶从生命历程视角看，个体生命始终嵌入历史时间，而青年期作为价值观与认同建构的关键阶段，往往是对社会结构性变迁最为敏感的时刻（Elder，1994）。社会变迁与重大事件往往使处于相似年龄段的个体共享类似的社会经验，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经历重大社会变动的人群，其影响往往更为深远（Mannheim，1952；Schuman and Scott，1989）。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正值东北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传统工业体系快速瓦解的关键阶段。伴随工厂关闭与单位制解体，城市生活秩序与

3. 曾璇：《班宇：小说要勇于尝试，抵达事物的最深处》，载《羊城晚报》2019年4月15日A10版。

4. 在“一席”公开演讲中，双雪涛（“冬天的骨头”）和郑执（“面与乐园”）通过回忆下岗家庭的经历，呈现一种以集体经验为基础的创伤叙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笔者在东北进行田野访谈时发现，年长一代的下岗亲历者往往对在公共场合或向陌生人讲述这段经历感到痛苦且勉强，这反映出不同代际在创伤叙述方式上的显著差异。

5. 曾璇：《班宇：小说要勇于尝试，抵达事物的最深处》，载《羊城晚报》2019年4月15日A10版。

6. 与传统“东北作家群”相比，“新东北作家群”展现出更为鲜明的代际特征。前者如萧红、萧军、舒群、罗烽和白朗，在进入关内文坛前已形成较为紧密的同志关系，其创作实践相互交织；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则各自独立进行写作，缺乏类似的集体网络（刘岩，2019）。固然，“东北作家群”内部亦存在年龄上的集中，但在新一代作家那里，正是这种缺乏集体网络的状态，使得其代际特征显得更为“纯粹”。创作主题的选择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回应历史时间的“召唤”。

家庭结构均遭重构。作为工人子女的“80后”一代,在童年尚可感知国家工业体制的余温,却在青春期直面父母下岗、生活崩塌与尊严溃散的现实困境。⁷这种“历史时间”与“生命时间”的叠合,使家庭记忆与重大社会变动深深交织,成为他们文学表达的基调。⁸

不同于体制化的职业作家,这一代作者多在成年后经历职业路径的转折,以“野生”姿态步入文坛,写作具有明显的回溯性。就此而言,文学成为他们在历史与现实夹缝中重建经验秩序、整合记忆碎片的一种实践。他们既未能继承父辈的工人阶级身份,也难以真正融入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身份的“中断”与“悬置”构成其阶级认同的核心张力。以双雪涛为例,其成长路径典型体现了转型时代工人子女的身份困境。他曾表示,“我从小其实一直希望完成父母的心愿,成为一个工工整整的学生”(双雪涛、走走,2015:200)。在他看来,“对父母一辈的‘叛逃’”不是背离,而是对已被现实否定的命运路径的反思与回应——“他们走的那个道路,经过事实证明是有问题的……我要去走另一条路”。⁹他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国家开发银行工作5年,直到2010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并于2012年辞职成为职业作家。他坦言,写作是想“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¹⁰

7. 与沿海地区相对平稳的市场化进程相比,东北的制度重构伴随更剧烈的社会失序。成长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80后”东北青年作家的创作风格受特殊成长经历影响,明显区别于同世代作家。独生子女一代整体成长于改革开放与消费文化扩张的时代,多以去历史化的“现在时”书写青春(如郭敬明、韩寒),但东北国企改革背景使作家更敏感于历史之重。郑执虽以青春文学起家,家庭变故促使其创作转向,其作品如《生吞》《仙症》开始关注城市、家庭与个人历史烙印对成长的塑造,摆脱青春文学的自我中心叙述,转向对时代伤痕的描写。

8. 在当前备受关注的“新东北文学”热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多集中于沈阳,尤其是铁西区,双雪涛、班宇、郑执甚至被称为“铁西三剑客”,使沈阳获得了“小说城”的象征性地位(刘岩,2019)。这种地理上的聚集不仅塑造了新东北文学的重要创作基地,也使铁西成为阶级记忆高度凝聚的文化空间。关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城市更新与记忆空间的塑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作展开。结合笔者在东北多地的调研经验,铁西区企业规模与等级不及鞍钢、本钢、油田等超大型企业,且地处城市中心,更新改造更为迅速,厂房与老旧生活区的快速消失,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难以通过建筑遗迹或社区形态延续,反而在文学中得以保存与再现。铁西在新东北文学中的频繁出现,或许正缘于这一地区工业记忆的断裂性与空间的转瞬即逝;在物理空间迅速消解的过程中,文学成为少数能够延宕并再造集体记忆的媒介,为社会学理解地方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经验窗口。

9. 论坛回顾,《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与新东北文学》, <https://bcaif.org.cn/26359057>。

10. 双雪涛、三色堇:《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庸俗》,载《北京青年报》2016年9月22日。

这些东北“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普遍带有一种深刻的“历史错位感”。这一错位感具有双重意涵。其一，植根于父辈作为工人阶级所经历的历史断裂。这一代父辈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步入单位体制的“转型一代”工人阶级（谢雯，2024）。他们青年时期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工厂，在单位体制中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保障和社会尊严，却在市场化改革中骤然陷入下岗危机，从曾经的“主人”跌落为“失落的一代”（Hung and Chiu, 2003）。其二，体现在“80后”一代作家的代际位置与经验结构之上。对这一代作家而言，工厂从未成为他们亲身参与的生产场域与社会空间，而更多是通过家庭叙述、代际传递与个体想象拼接而成的回忆图景。这种代际距离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成为连接父辈阶级史与自身时代经验的“代际转译”载体。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文学所展现的“历史共振感”。当时的作家多为体制内文艺工作者或工人作家，与工人群体有高度的阶级与代际一致性。¹¹ 这一代工人阶级及其文艺代表多出生于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亲历战乱与贫困，对新中国的成立充满感恩，并将其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与集体主义精神，可称其为“建设一代”。在国家主导的工业体系中，他们的阶级身份高度政治化、道德化，具有强烈的历史自觉与建设使命。正是在这种政治动员与历史参与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文学充满了对工业化的浪漫想象和对工人主体性的礼赞，呈现作家与工人共同书写国家历史的文学姿态（彭圣钦、周晓虹，2021）。

在这种对照下可以看到，“80后”东北作家的叙事实践不再着力于生产现场的再现，而是转向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与生命经验的梳理。他们的文学创作以“我”的经验为中心，呈现一个“找寻的、隐忍的、诠释的以及探知的‘我’”（阿斯曼，2017：56）。父辈的阶级经验在他们笔下成为理解历史的中介，被重新加工、象征化，并转化为具有文化意义的历史资源。这种对父辈经验的再阐释，既是作家在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处理自我与历史关系的主体性策略，亦是其重建个体历史感与时代位

11. 例如，草明（生于1913年）于1954至1964年任鞍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副书记，在此期间，她创作了《乘风破浪》，建构出与国家历史任务深度绑定的工人阶级主体形象，成为20世纪50年代工业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置感的文化实践。因此,值得进一步追问的已不再局限于这些作家如何再现父辈的经历,而在于他们如何在父辈阶级经验日渐隐退的当下,通过个体化的生命叙述与文学表达,重新建构与历史之间的情感共鸣与认知理解,并在代际错位的语境中探索新的身份认同与时代意义。

三、阶级经验与记忆的代际传承与转译

在以双雪涛为代表的东北“80后”作家的写作中,父辈的阶级经验并未以线性传承的简化形态呈现,而是借助多元的心理表征与叙述策略,生发出代际传承的复杂样态与内在张力。整体而言,从这些作品中大体可以辨识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阶级叙事路径:其一,围绕下岗家庭展开叙述的阶级耻感与创伤性记忆,关注个体如何在情感创伤中保存并转化历史经验;其二,对阶级伦理的主动继承,反映出工人阶级伦理的代际内化与延续;其三,阶级经验及其认知方式在传承中发生断裂,进而被提炼为超越现实的象征性表达,形成一种带有“超越性”意味的阶级叙述。这三种路径共同勾勒出东北“80后”一代作家在保存、转译乃至重构工人阶级历史经验方面的多重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路径也并非静止分立,而是在创作主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环境的变动中不断交织、演化。以双雪涛为例,其不同阶段的作品便呈现出从创伤叙述到伦理承继,再到象征性超越的多层转向。

(一)阶级耻感与创伤性记忆

双雪涛在早期创作中曾尝试奇幻题材,其中一部作品在台湾获奖,随后逐渐转向更具现实质感的写作风格。《聋哑时代》以其初中生活为背景,聚焦父母下岗时期的家庭处境。这一时期既是他个人社会认知的关键阶段,也构成了“下岗家庭的孩子”共同的心理创伤。他这样写道:“那个年龄对人生十分关键,是类似于进入隧道还是驶入旷野的区别”(双雪涛、走走,2015:203)。尽管在技艺上尚显稚嫩,他依然坦言“没有自悔少作”(双雪涛、走走,2015:197),并将写作视为与过往生命经历的对话与和解,是将莽撞的冲动转化为叙述能量的自我实践。

《聋哑时代》以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呈现一个工人家庭在制度裂变中经历的经济滑落与身份崩塌。故事发生在1997年,“我”小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正是家庭命运急转直下的节点。父母作为“按部就班的一对幸福的工人阶级”尚未意识到,他们赖以维生的工厂已“岌岌可危”。

即便侥幸“薪水减半，继续留下”，也清楚这“一半的薪水迟早不保”，而无力挣脱的现实是“除了拧螺丝之外……再没有谋生的技能”。这种困境在叙述者的童年记忆中凝结为“一种被时代戏弄的苦闷”——他们或许早已默然接受现实，只能自我安慰“无论如何，国家也能给口饭吃吧”（双雪涛，2016a：5）。

同年，“我”考上市里最好的108中学，却因无力负担9000元的择校费而几近失学。¹²母亲为此四处奔走，问亲戚借遍才勉强凑齐这笔费用，而在筹款过程中，她才惊觉：“原来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富人，每个人都提着一塑料袋的钱，等着那些因为凑不足九千块钱的家长漏下的名额”（双雪涛，2016a：17）。进入初中后，更隐微的羞辱在日常交往中悄然浮现。一次语文课代表告诉“我”，老师调查了家庭成分，说“你家是工人阶级，扶不上墙”（双雪涛，2016a：32）。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语，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社会语境中工人阶级形象的贬值与被污名化：曾被一代人视为荣耀的身份标签，在叙述者的青春记忆中逐渐退化为被讥讽的符号，甚至被内化为对未来的隐性障碍。

父母下岗后，“相互扶持着卖起茶鸡蛋”，始终坚持用真茶叶煮蛋，是街上唯一不用调料包的摊贩，只因“不敢骗人，似乎觉得骗了人自己前半生的修行就毁于一旦了”（双雪涛，2016a：107）。这种对“真”的坚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格格不入：成本更高、味道却常被顾客嫌“不够正宗”。“我”劝说父母顺应市场口味却屡遭拒绝，在一次争执中，父亲突兀地说：“别看我卖茶鸡蛋，可我一辈子是共产党的工人。”这句突

12. 为了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满足社会对选择性教育的需求，沈阳市自1994年起通过公办中小学改制的方式，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旨在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打破以往由政府单一办学的旧模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在这一改革背景下，一批经市教委批准的初中被允许招收特长生和特需生。其中，特需生的收费标准由学校自行确定，每生3年收费6000元至9000元。沈阳134中学下设的宇光中学、沈阳126中学下设的敬业中学、沈阳铁路实验中学下设的英才中学等，均采用3年收费9000元的自费入学制度，俗称“九千班”。2005年5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标志着教育政策从追求优质与效率转向以“均衡”为核心目标。政府开始调整办学思路，强调通过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来实现教育公平。在这一政策导向下，沈阳市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小学和初中的“择校生”招生制度，“九千班”亦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刘天宇，2022）。参见沈阳市教育志编写办公室编，《沈阳教育年鉴1991—1994》，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7、29、201页；刘国瑞主编，《老工业基地振兴十年来的辽宁教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8—329页。

如其来的表述令“我”哑口无言(双雪涛,2016a:108)。在工人阶级地位不断滑落、市场逻辑日益主导社会价值的时代背景下,父亲的坚持不仅显得迂执,更显露出一种对旧有身份伦理的顽固守护。然而,于“我”而言,这种道德逻辑既难以理解,也难以承继,只能在沉默中与家庭渐行渐远。上大学后,“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漠视逐渐成为日常,“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除了要钱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可我只有催眠自己,让自己假装什么也不知,把这该死的书念完算是拉倒吧”(双雪涛,2016a:108)。这种自白揭示了阶级断裂在代际关系中的情感形态:它并未表现为公开的冲突,而是一种深沉的疏离与情感麻木。

在《聋哑时代》中,“阶级”不再是抽象的结构性概念,而是以切身的的生活经验成为少年成长叙事的一部分。父母下岗后的街头谋生、因家境拮据而无力承担择校费用,以及“工人子弟”在校园中遭遇的隐性歧视,共同构成了一条被边缘化的成长轨迹,并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积淀为深刻的阶级耻感。这种耻感既体现在童年时期被轻视、被羞辱的瞬间,也在成年后转化为回避与压抑的心理机制。工人家庭在转型社会中的边缘化体验,以一种情感化的方式渗入个体的性格与情感结构,成为难以消解的心理负担,并在生命史中留下持久印记。

(二) 阶级伦理的内化与风格的承继

如果说早期创作侧重于对创伤性记忆的回望,那么在随后的作品中,双雪涛的写作逐渐转向另一个维度:对工人阶级伦理与精神气质的理解、认领与承继。在一次访谈中,他直言:“我觉得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沉默的,比我们要更有生命力,比我们要笃定。”¹³若说《聋哑时代》是以回忆为核心的自我疗愈,那么《大师》则更接近于在生命的困顿时刻,向父亲发出的一封求救信。双雪涛在写作随笔中回忆道:

我的父亲活得不算长,可是已经赢得了我的尊敬和思念……《大师》不是为他做传,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大师》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决心,我希望能把在他那儿继承下的东西写在纸上,如果我和他一样,无声无息地做着自己的事,然后结束,那也不错。(双雪涛,2023:201-202)

在这一作品中,双雪涛正是借助文学的形式,反思自身在转型社会中的位置与困惑,并回应对自我命运的追问。他试图探寻:当个体决意

13. 张悦然、双雪涛:《时间走廊里的鞋子》,《收获》微信专稿,2015年3月2日。

偏离既有的、相对安全的生活路径时，是否仍可在精神上为这一选择——继续写作——找到持续前行的理由？《大师》中的父亲形象凝聚了工人阶级在历史绵延中沉淀下来的节奏与气质——那种沉默中的坚韧、忠于本分的姿态，对体面生活的执着、对命运安排的默然接受，以及“无声无息地做着自己的事”的生存哲学。正是在对父辈生活态度的重新理解中，双雪涛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节奏与精神方向，“比以前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对一些，忽然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比较适合我的风格”（双雪涛，2023：92）。

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双雪涛的叙事视野显著扩展。他开始超越个体成长的自传性叙述，借助虚构人物与社会事件，力图呈现转型时代中阶级伦理的裂变与延续。《平原上的摩西》便是这一转向的集中体现。小说以庄德增与李守廉两位人物构成价值分化的镜像。庄德增早年曾是“红卫兵小将”，改革开放后迅速适应新的经济逻辑和社会节奏，游刃有余，最终成为体制转型的获益者。他承包工厂并当上厂长，是李斐眼中“有名的活跃分子”，“总是穿得很好，能办别人办不成的事儿”（双雪涛，2016b：13）。与之相对的是李守廉。他曾在傅东心父亲被抄家时挺身而出，体现出一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仍存的人际关怀。他名字中的“守”寓意坚守，“廉”则象征清正与节制。在价值体系剧烈变动的年代，李守廉未能及时适应新规则，也未被社会认定为“成功者”。他的人生渐趋艰难，最终在命运的重压与意外的连锁反应中走向犯罪。

在双雪涛的笔下，李守廉不能简单归为传统意义上的“失败者”。他的“失败”背后体现的是另一种价值取向——对他人处境的关切、对行为底线的坚守。这些品质构成了工人阶级伦理的基本框架，即使在尊严受损、物质匮乏的双重压力下，也未被彻底压垮。李守廉的沉默与坚持未必能换来现实中的回报，但正是这种不依赖“成功”定义自身的姿态，展现出一种朴素而坚实的尊严感。这种伦理态度在“新东北文学”中反复出现，成为理解工人阶级价值体系和这一文学脉络的一条重要线索。

（三）阶级经验的断裂与阶级的“超越性”意义

双雪涛的创作常带有深层的精神性思考。他在多部作品中有意识地融入宗教意象，以探索世俗经验之外的精神寄托与超越性结构。《平原上的摩西》和《光明堂》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两部作品在叙事层面引入宗教元素，同时通过人物命运的安排与叙事结构的打造，展现出

接近神学反思的精神维度。值得注意的是,双雪涛谈及另一篇小说《飞行家》时表示,该作品虽无《光明堂》那种强烈的宗教氛围,但是在他心中,“它也是有‘超越性’的一个东西,但它具体是什么我也很难解释清楚……”¹⁴由此引出问题:《飞行家》中这种“超越性”的根源何在?本文认为,这种超越性不来自宗教信仰,而是植根于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阶级意涵及其承载的革命意识形态。双雪涛尝试将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与非宗教的阶级历史经验相结合,通过文学叙事,对阶级经验进行重新诠释。

《飞行家》以“我”——一位离家多年的成年子女——的视角展开,通过重返家乡的旅程,修复在历史变迁中断裂的家庭记忆与情感联系。作品以高家三代的命运构建出一个典型的“代际谱系”,展现不同历史阶段阶级经验的传递与转化:高立宽代表“建设一代”,其人生轨迹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进程密切关联,体现出对集体主义与国家使命的深度认同;第二代人物,如高旭光、李明奇,生于1950至1960年代,在理想主义与体制转型的张力中徘徊,于市场化改革及单位解体中经历身份与价值的重组,折射出“转型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第三代,即“我”与李刚,成长于市场化时代,其主体经验更多植根于个体选择与后工业社会逻辑,已基本脱离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可被视为“市场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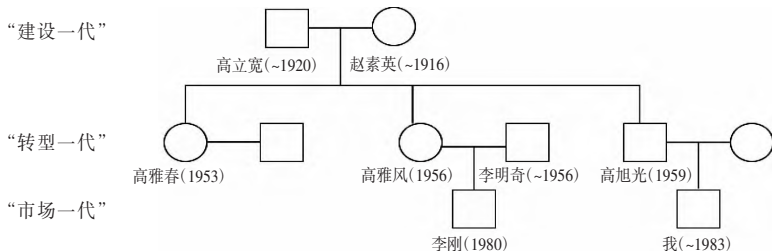


图 1:《飞行家》中的高家谱系图¹⁵

14. 论坛回顾,《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与新东北文学》, <https://bcaf.org.cn/26359057>。

15. 人物出生年份主要依据文本中给出的时间信息和关键生命事件进行推算。例如,文中提及高立宽1936年入党,“老革命”一般入党时间较早,这里按照其16岁入党计算,可推测其大约出生于1920年,赵素英比他大四岁,大约出生于1916年;高雅风在1979年为23岁,则出生于1956年;再结合高家姐弟相差三岁,据此可推定高雅春出生于1953年,高旭光出生于1959年;李明奇与高雅风年岁相仿,亦可推定其出生于1956年前后。李刚在2016年36岁,可见他出生于1980年,按照父母的年龄差距,“我”大概比李刚小三岁,大约出生于1983年。

小说中核心人物李明奇的志向是制造飞行器，设想以此缓解未来大城市的交通困局，“我这个飞行器不走马路，从人脑袋顶上过，不走美国的弯路，直接赶英超美”（双雪涛，2017：160）。这一形象体现了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对技术的信仰与改造现实的理想，同时承载着深刻的政治意涵——技术在此象征国家自主与历史进步，标示着工人角色从执行者向创造者的关键转变。在这一框架下，技术成为阶级主体性的体现，是工人阶级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李明奇对飞行器的执着，正源于这一代工人对自身能力与时代使命的信念，折射出劳动者特有的精神世界与历史自觉。

从制度与思想的双重视角来看，“转型一代”跨越了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既见证了单位体制的成长，也经历了其瓦解。¹⁶与李明奇的技术理想相对照，高旭光则体现出“转型一代”的麻木与退却：“脑中的一片区域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被纷乱的现实像强光一样持续地照耀，以至于不再有太多的感觉，于是也不愿意做太多的变动，令自己的人生道路冒险地向一个有希望的所在延伸过去”（双雪涛，2017：163-164）。他拒绝理想、甘于现实，但在李明奇的一次屋顶演讲中，仍产生短暂的精神共鸣，甚至联想到欧文、圣西门与傅立叶等人的乌托邦想象。这种精神“刚蹭”虽未改变其生活轨迹，却在内心留下深刻印记，革命理想的残余以碎片化、情感化的形式在“转型一代”心灵中延续。尽管李明奇在市场改革中屡遭失败——从煤炭、餐饮到直销、走私均未成功——高旭光仍将其视为“不是一般人”，并将对李明奇的认同转化为对“我”的嘱托：如果有一天李明奇请帮忙，最好帮一下，这人“只是命不好，没起来”（双雪涛，2017：152）。¹⁷

然而，“我”与李刚的对话则揭示了这种认同在“市场一代”中的转译困境：

16. 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来信”及其引发的思想震荡，恰是这一代人在“告别革命”过程中信仰断裂与意义危机的典型体现（参见狄金华，2024）。

17. 与李明奇和高旭光不同，小说也刻画了“转型一代”心理结构的另一面，以高雅风为例，她在1979年曾对改革满怀希望，到2015年则变得衰老消沉。在一次会面中，她在外部归因（如烟囿妨命）与自我归责（跳舞毁了人生）之间反复摇摆，显示出这一代人在单位制解体后普遍面临的认知困境，即他们曾将人生规划高度寄托于单位体制所构建的稳定制度结构之上，当这一结构瓦解，加之中年遭遇种种不顺，彻底从“历史的参与者”变成了“历史的承受者”，个体能动性被宿命论所替代。

你知道你二姑父造过飞行器吧?我说,飞行器?他说,是飞行器,能上天那种,像个背包,他后来起名叫便携式飞行器。我说,不知道。他说,很快败了,怎么可能成功?飞行器?那世界不是乱了?我说,嗯。他说,你爸还帮他弄过零件。我说,我爸?他说,是,你爸,我舅,帮他偷过工厂的零件。我说,我爸还有这胆子?他说,你大姑,也借过他钱,让他弄飞行器。不知道为啥,全家人都相信他能搞出来。(双雪涛,2017:171-172)

“市场一代”成长于高度专业化与资本化的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结构中,技术已脱离理想的象征意义,转化为以效率和收益为导向的运作逻辑,普通人缺乏直接参与的空间。李刚的反问——“那世界不是乱了?”——折射出市场逻辑对李明奇“非理性姿态”的排斥。在这一逻辑下,李明奇的失败无需解释,他的梦想也难以获得理解与认同。曾经的以“人定胜天”为核心的工人阶级伦理,如今仅在高旭光的意识中留有微弱回响,而在李刚与“我”的意识中则被现实迅速压制。¹⁸这种代际差异揭示了革命理想主义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逐渐失效。

小说结尾的象征性场景——李明奇与同辈及其子李刚乘坐热气球,从沈阳红旗广场缓缓升空,而“我”在地面注视——将代际的断裂转化为一种精神隐喻。飞行在此已不再意味着对现实的改造,而是一种姿态性的坚持,是在无法改变的社会结构中维持理想的最低限度。热气球穿越主席像上空,最终消失于夜色,这一画面将革命理想的残余转化为短暂的光亮,既暗示其延续,也表明其在当代语境中不可避免的消散。这一象征揭示出一种层次复杂的历史情感结构。革命理想虽已失去现实的依托,却以文化与记忆的形式延续下来,成为当代人想象未来的语言与情感资源。其意义不在于复原一个可回归的过去,而在于保留一种尚未完成的可能性——一种“未竟的希望”(布洛赫,2012)。文学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回应那些难以被直接言说的社会矛盾,正如詹姆逊(Jameson, 1981)所强调的那样。《飞行家》中的热气球意象体现了这种象征功能。它在“市场一代”的情感与认知结构中,重新翻译了革命理想,表达出一种被削弱的超越冲动:个体仍渴望超越现实,却又意识到

18. 作为“建设一代”的高立宽对李明奇的支持动因更为复杂,背后是姻亲关系和师徒制两条线索在起作用,笔者在这里暂不展开讨论,只是强调同为“转型一代”的高旭光的认同机制与“市场一代”的李刚和“我”的断裂机制。感谢评审专家指出这一点。

这种超越终将受到现实重力的限制。

总体而言，以双雪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东北作家在回访工人阶级经验的书写中，呈现这一阶级历史经验的多重面向：它深植于革命意识形态结构之中，承载着特定的伦理价值，经历了转型期的被边缘化，又保留着理想的未竟性。这种阶级叙事虽然表面上书写的是“父辈”的故事，实则是“子辈”即“80后”一代在自身时代处境中重新生产的历史想象。作品中那种“找寻的、隐忍的、诠释的以及探知的‘我’”（阿斯曼，2017：56），恰恰映照了子辈面对父辈经验时的情感纠葛与认知张力。经过早期创伤性写作与对青少年阶级耻感的直面，东北“80后”一代作家逐渐以反思姿态重构父辈的阶级经验。他们不再将父辈历史简单归结为“失败”，而是重新审视转型时期成功与失败的标准，理解工人阶级伦理的价值逻辑，并从批判父辈“顽固不灵”转为主动认可其应对困境的生活智慧。然而，这种认同并不意味着回归。正是在这种“理解却无法重返”的张力之中，历史经验被重新激活，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遗产——一种被后代继承、反思并不断重写的历史资源。

四、跨地域与跨代际的情感共鸣

新东北文学所呈现的不只是“东北的故事”，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转型叙事。东北作为国家工业化的典型区域，其国企改革、产业调整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解体效应，为观察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个高度集中的窗口。这些剧烈的变化在东北表现得尤为典型，却不为其所独有。无论在西南、西北还是中部的传统工业城市，类似的结构性的震荡同样存在。正因如此，来自不同地域的许多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并不止于旁观，而是从中辨识出自身社会处境的投影，将地方经验转化为个人情感的寄托空间。¹⁹

即便对于未亲历体制转型的读者而言，这些作品仍具有现实关切。文学的感染力往往源于其对普遍心理状态的精准捕捉。当个体在现实中感受到的焦虑、不安与失落被文本赋形时，阅读过程中便可能产生情感的共鸣（Illouz，2014）。新东北文学所揭示的，正是转型时代的集体心

19. 与东北的转型经历相似，广大三线城市也经历了工厂关闭与社会重组。更大范围的厂矿子弟开始回望自身的成长历程，他们的记忆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与以东北转型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形成了共振。

理困境：阶级位置的模糊、前途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生活意义的持续追问。这些情绪并不专属于东北，而是弥散于所有在社会变迁中承受结构性压力的群体之中。班宇对此有这样的观察：“我们此刻和东北当时的精神位置上是相同的，在一个正弦波上，所以会产生一些共振。即便今天经济情况不再一样，但精神困境也许一样，所以会有感同身受。读者和我不是寻找记忆，而是对照当下处境。”²⁰

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阶级”已逐渐剥离可被直接指认的结构性位置与固化的政治身份属性，转而成为一种在具体情境中被持续感知、不断经验化的动态社会范畴。对于当下的新一代读者而言，阶级认知的形塑往往并非源于直接的劳动场域经验或物质生存处境，而更多植根于对社会流动机会收缩、主流中产话语体系式微的现实体认。在一次读者对谈中，有年轻读者自我定位为“小资产阶级读者”，他们虽不等同于“新工人”意义上的底层，但也属于“一二线城市、特别是北上广的‘底层’”，可被概括为“底层化了的小资群体”（杨晓帆等，2020：36）。有读者坦言，他们并不是因“改变无望”才阅读这些作品，而是仍对世界抱有希望，“还不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复杂的时候，才会有一些作品当中培养某种趣味”，而一旦意识到“自己可能即将成为或者说实际上已经成为失败青年的一员时”，反而不会看这些作品了（杨晓帆等，2020：43-44）。这一阅读心理揭示出新东北文学的情感效应建立在一种特定的临界状态上：读者对结构性困境已有初步感知，但尚未彻底陷入其中，对未来仍保有希望和想象。

虽然这一自我认定为“底层化小资”的群体未曾亲历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单位生活，也未直接经历国企改革和“下岗潮”的冲击，但他们同样面临着阶级身份的结构性不确定性。这一代主要由“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人，成长于改革开放的上升期，其父辈依托快速城镇化、教育扩张、职业机会与住房红利，实现了初步的阶层跃升，构筑起看似稳固的中产生活世界。然而，当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流动的结构性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教育的普及并未转化为相应的上升通道，反而在同代之间制造出激烈的“内卷”竞争；同时，就业的不确定性与高企的房价持续侵蚀着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使他们既难以确信自身能稳固继承父辈的

20. 夏阿怪：《班宇：我不太理解很多人一想到东北就难受》，“城市画报”微信公众号，2020年7月9日。

中产位置,又无法认同“新工人”式的阶级身份。在这种临界处境中,家庭出身与个人前景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社会角色与生活预期被迫悬置。由此,年轻一代逐渐生成一种模糊的“类底层阶级”体验。斯坦丁(Standing, 2012)将青年人归入“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下青年群体的处境与传统阶级范畴之间的张力。此时,“阶级”不再依赖生产关系或职业划分来界定,而是在代际经验、教育轨迹与结构性焦虑的交织中被不断感知。

新东北文学中的暴力书写呈现独特的情感政治。不同于传统文学中戏剧化的激烈冲突,这里的暴力更像是长期压抑情绪后的瞬时爆发,潜伏于平静而克制的叙事节奏之中,成为对持久羞辱与情感压抑的象征性反抗。在绩效导向、表达受限的当下社会环境中,个体所承受的隐性压力难以在公共领域被言说,文学为这些情绪提供了象征性的出口。虽然这种“出口”无法撼动现实的结构性秩序,却在情感层面为读者恢复感知、释放焦虑提供了可能。易烱千玺曾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阅读班宇小说集《冬泳》的照片,并表示最喜欢书中的同名篇目,讲述了一个看似什么都不在乎的青年,在长期忍受羞辱后于最后一刻拾起砖头反击的故事。“反正他拿砖头打那个男人的时候,我是没想到”,他的这句评论正体现了读者的惊异反应,也道出了这个情节的张力所在:那些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如何在突兀而果断的瞬间爆发,让人于震惊中感到一种奇特的痛快。²¹

在出版实践中,新东北文学的出版方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面向“平凡人”的叙事框架。以双雪涛为例,《平原上的摩西》腰封以“平常人的不得已、平常人的不平常”(双雪涛, 2016b)为标语;《飞行家》则宣称“大雪覆盖不了凡人的热血,尊严和自由在绝境里逢生”(双雪涛, 2017)。这些话语强调普通个体经验的价值,为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权利的群体赋予象征性尊严。与中产阶级叙事中对教育、职业与社会流动的强调不同,这类“平凡人叙事”承认现实的不确定性与行动的局限,肯定个体在困境中维持体面与秩序的努力,为当下青年群体在“中产焦虑”与结构性困顿之间提供了替代性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坐标。

在对工人阶级经验的书写中,作家往往融入自身的审美判断与情

21. 李颖迪:《班宇:易烱千玺喜欢看我的书,这小孩挺好,我挺高兴》,“智族 Life”微信公众号,2019年8月30日。

感表达。双雪涛在《北方化为乌有》中设计了一位出版人角色,其直言:“我是南京人,没去过东北,你写的东北我不相信,但是我会哭,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你的书。”她随即追问:“那是你意念中的真实,那些人没那么好,对不,要不然你也不会大年三十不回去。”(双雪涛,2017:181)这一对话揭示出,情感共鸣并不完全建立在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更多源于作家通过叙事建构所创建出的情感体验。即便读者缺乏有关东北工业社会的直接经验,他们仍会被文本的情绪张力所打动,对书中人物未竟的生活理想产生惋惜与共情。作品中人物所体现的尊严、体面与忍耐,激发了年轻读者面对现实困境的情感投射,使工人阶级的经验得以超越地域与时代,成为理解当代阶级感受与代际心理的重要象征。这种“情感真实”所承载的社会意义,正是文学社会学研究中更值得关注的对象(参见刘亚秋,2019)。

实际上,早在2011年就有学者提出“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将其视为继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群”之后的文学谱系(林焱,2015)。然而,当时除郑执外,其他两位“80后”作家尚未开始写作生涯,这一群体概念主要指向如李铁、孙春平和津子围等前一代作家。20世纪90年代,当“计划”让位于“市场”,改革的压力冲击着衰退的东北工业,这些作家以悲悯与焦灼的目光书写东北工业的退场,然而其作品在当时并未引发广泛关注,东北的辉煌也在他们的低沉叹息中逐渐消逝。吊诡的是,“80后”一代“新东北作家群”获得集体关注之后,大众与评论界对这些曾经直面改革现实的作家及其作品依然兴趣寥寥。反而是经由“80后”作家转译的文学文本,更精准地触及了当下社会的普遍情绪,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共鸣。这一现象表明,面对工人阶级所经历的历史性创伤与制度遗产,公众与评论界更倾向于以一种审美化的距离来把握“东北经验”的象征意义,而非追溯改革过程中的具体现实。²²

在新东北文学中,“东北”已不再只是对特定地域与历史时期的指

22. 从“东北文学”的发展路径来看,地域文学流派的形成不是学术话语单向“命名”或简单归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尤其需要经过大众情感结构与集体经验共鸣的检验。文学流派的确立,体现着创作主体的集体意识,同时也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感受到”的文化现象。以萧红等人代表的东北文学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并被视为独立的文学传统,正是因为它捕捉到特定历史阶段个体的生命体验——战乱与漂泊中的个体,在生死之间浮沉的小人物,以及他们面对家国命运的挣扎。这些经验虽具有地域性,却超越了地域界限,唤起了更广泛的共情与反思,从而确立了东北文学的“公共性”。

涉,而是被提炼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象——转型社会中失落、断裂与无力感的象征性表征。其普遍性的生成,并不依赖于地域经验本身,而是与当下青年群体在阶级结构中的“类底层”体验与持续的身份不确定感相关联。这些作品为青年提供了一种“平凡人认同”,使他们得以将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失落感以及微弱的反抗情绪,投射到文学所建构的社会经验之中。虽然“新东北文学”的创作者多为“80后”,但其作品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早已超越家庭内部的代际区隔,延伸至“90后”与“00后”读者群体。这种跨代际的情感共鸣,建立在对社会结构固化与上升通道受阻的共同感知之上,展现了文学在社会经验传递与阶级意识形塑中的独特作用。

五、余论

本文对“新东北文学”现象的分析,区别于既有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子一代”与“父一代”家庭代际叙事以及“子一代”重建“父一代”工人阶级尊严的路径。本文认为,作为“子一代”的东北“80后”作家,其书写首先是一种回应自身困境的行动——在成年后重新处理作为“下岗家庭的孩子”所经历的成长体验与创伤性记忆,尝试在历史流变中重新锚定自我的位置,整理自身对于转型过程的理解。而在阅读和传播过程中,超越东北特定家庭构型与代际关系的、更为开放的“社会代”脉络逐渐形成。特定的情感结构跨越出生年代,促成了不同社会代之间的情感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转型时期的阶级经验不断被转化为回忆与叙事的参照点。东北“80后”一代作家一方面目睹父辈作为工人阶级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深陷身份不稳的现实处境。他们的创作既是对家庭史与个人生命史的回望,也是一次对代际经历的转译尝试——通过将家庭创伤与个人体验转化为当下可感的语言,与更年轻的“后记忆一代”(Hirsch, 2008)建立情感联结。正是在这种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转型社会中阶级经验的不稳定性、断裂性与共通性得以凸显。由此可见,“新东北文学”的书写并非局限于地域或家庭的局部叙事,而可被视为一种围绕“阶级”范畴展开的跨社会代的叙事实践与情感共鸣建构。

周晓虹(2011)借鉴帕克(Park, 1928)的“边际人”概念,提出“历时代边际人”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转型中个体处境的独特性。这种边际性源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更迭,个体在旧秩序与新秩序的缝隙中穿

行,由此形成一种兼具过渡性、易变性与矛盾性的“转型人格”。然而,与周晓虹侧重二元对立与两极张力的边际性论述有所不同,本文更关注转型社会中边际经验的多元形态与非二元特性。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具有高度多维的复杂性,这一转型过程不仅是制度更替的结果,更是认知体系、制度结构与社会关系交错作用的产物。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阶级秩序的边界经历了持续的重叠、交叉与再定位,而不是泾渭分明的“政治-市场”二元分割状态。个体的社会位置因此常常游离于既定的阶级框架之外,呈现多重归属与多重排斥并存的状态。这种由阶级重构所生成的多重边际性经验,揭示了转型社会中个体处境的复杂形态,也为理解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在压缩式发展与快速市场化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均经历了深刻重塑。每一代人都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在秩序持续重组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定位与意义框架,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边际人”的状态。老一代工人阶级在计划体制解体后迅速失去制度保障,成为“失落的一代”;而成长于市场化环境和中产叙事中的年轻一代,也逐渐意识到所谓“中产”地位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难以提供稳定的社会坐标。新东北文学中刻画的“阶级跌落者”形象——那些曾经拥有尊严却在时代变迁中被边缘化的工人阶级——与当代青年在面对阶层固化与身份不稳定时所体验的无力与焦虑,在情感层面形成了隐秘而广泛的跨代际共鸣。这种共鸣并不依赖对东北经验的直接同理,而是源自一种更为普遍的感知:对加速变迁中身份秩序松动的切身体会。它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潜入文学文本,无须诉诸显性的意识形态,却在情感层面生成联结,最终构建出一个以阶级变动、焦虑与不确定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

作为一个历史可变的社会范畴,“阶级”承载着转型期个体的自我感知、情感体验、生活预期与奋斗目标。历史中的阶级经验在被记忆化与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其具体内涵得以延续,包括有关体面与尊严的规范性话语、代际传递的行为准则、对职业与社会地位的期待,以及围绕劳动价值的道德判断。通过文学叙事,这些要素被重新表述并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进而引发不同代际主体的再解读与再诠释。可以说,真正

得以延续的不只是情感,还有一整套由记忆、规范、话语与实践构成的阶级资源。这些在历史中形成并不断被重释的阶级资源,构成了当代社会在优绩主义之外的重要参照体系。

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被动再现,而是一种主动参与意义构建的实践形式,也是一种具有社会洞察力的叙事机制,帮助我们捕捉转型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在日常生活中引发的细微变化。当社会学在方法论与本体论层面回应费孝通(2003)所言的“将心比心”(周飞舟,2021)时,社会学家也应如小说家一般,关注人的心态、精神世界与生活经验(渠敬东,2019)。社会学的任务不仅是揭示社会结构的运行逻辑,更应倾听那些被遮蔽的精神困惑与情感回声。当前学界日益重视如何从本土经验出发重建中国社会研究的知识基础与方法论路径,越来越多研究者意识到,唯有深入理解“叙事”本身,才能触及那些细腻而复杂的故事(成伯清,2015;刘子曦,2018)。在这一背景下,文学社会学有可能突破经验主义对“可观测事实”的依赖,转而探寻制度变迁背后缓慢生成的情感结构与价值调整,从而更深刻地把握社会转型所激发的多重社会想象。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阿斯曼,阿莱达.2017.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M].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阿斯曼,阿莱达.2021.经典与档案[G]//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编.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23-136.
- 布洛赫,恩斯特.2012.希望的原理(第1卷)[M].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成伯清.2015.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J].江海学刊(5):100-106.
- 丛治辰.2020a.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3-33.
- 丛治辰.2020b.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J].扬子江文学评论(4):67-75.
- 戴锦华.1999.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狄金华.2024.理想之光与沉闷的阴霾——对大变革时期生命与心灵的观照[J].开放时代(5):30-56.
- 方维规.2011.文学社会学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费孝通.2003.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16.
- 高柏.2021.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以共同富裕应对五大挑战[J].文化纵横(6):22-31.
- 黄平.2017.“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J].扬子江文学评论(3):12-18.
- 黄平.2020.“新东北作家群”论纲[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174-182.

- 林晶.2015.“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J].芒种(23):104-105.
- 林毅夫、付才辉.2017.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吉林振兴发展研究——《吉林报告》分析思路、工具方法与政策方案[J].社会科学辑刊(6):5-20.
- 凌鹏、孟奇.2023.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J].社会(1):173-202.
- 刘天宇.2022.虚实之间:《平原上的摩西》社会史考论[J].扬子江文学评论(2):40-47.
- 刘亚秋.2019.记忆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兼评文学作为“田野”[J].新视野(1):104-111.
- 刘亚秋.2021.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岩.2019.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J].文艺争鸣(11):22-31.
- 刘岩.2024.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子曦.2018.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J].社会学研究(2):164-188.
- 彭圣钦、周晓虹.2021.现代性的再启与“工业中国”的想象——以20世纪50年代草明的工业小说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28-137.
- 渠敬东.2019.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J].社会(1):1-36.
- 双雪涛.走走.2015.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J].野草(3):196-206.
- 双雪涛.2016a.聋哑时代[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双雪涛.2016b.平原上的摩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双雪涛.2017.飞行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双雪涛.2023.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田毅鹏、康雯嘉.2019.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研究三十年[J].开放时代(6):54-65.
- 王德威.2019.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J].文艺争鸣(7):35-39.
- 王德威.2021.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J].小说评论(1):60-75.
- 肖瑛、孙绍文.2017.“格”与准自然社会中的公共秩序——基于《马桥词典》的分析[J].开放时代(5):144-165.
- 肖瑛.2019.从社会学出发的文学社会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20日,第006版.
- 谢雯.2019.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J].开放时代(6):25-44.
- 谢雯.2024.转型中的生命体验:东北社会变迁的双重时间性[J].社会学研究(2):111-133.
- 杨晓帆,等.2020.希望,还是虚妄?——当“东北文艺复兴”遭遇“小资”读者[J].文艺理论与批评(5):32-45.
- 郑少雄.2018.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基于阿来四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人类学分析[J].社会(2):84-110.
- 周飞舟.2021.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12):37-54.
- 周晓虹.2011.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J].天津社会科学(6):12-19.
- Abbott, Andrew. 2007. “Against Narrative: A Preface to Lyr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25(1): 67-99.
- Adams, Julia, Elisabeth Clemens, and Ann S. Orloff. 2005.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Three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72.
- Alexander, Jeffrey C. 2004.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Cultural Trauma and*

- Collective Identity*, edi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and Piotr Sztompk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0.
- Bendix, Reinhard. 1967.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3): 292-346.
- Elder, Glen H., Jr. 1994.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1): 4-15.
- Ferguson, James. 1999. *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iswold, Wendy. 1993. "Recent Moves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1): 455-467.
- Hirsch, Marianne. 2008.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Poetics Today* 29(1): 103-128.
- Hung, Eva P.W. and Stephen W.K. Chiu. 2003. "The Lost Generation: Life Course Dynamics and Xiangang in China." *Modern China* 29(2): 204-236.
- Illouz, Eva. 2014. *Hard-Core Romance: Fifty Shades of Grey, Best-Sellers,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nglis, David. 2014. "What is Worth Defending in Sociology Today? Presentism, Historical Vision and the Uses of Sociology." *Cultural Sociology* 8(1): 99-118.
- Jameson, Fredric.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nnheim, Karl.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76-320.
- McClelland, David C.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Olave, María Angélica Thumala. 2018. "Reading Matters: Towards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Rea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6(3): 417-454.
- Park, Robert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6): 881-893.
- Schuman, Howard and Jacqueline Scott. 1989.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 359-381.
- Standing, Guy. 2012.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44(4): 588-608.
- Vuña, Jan. 2020. "Theorizing the Social Through Literary Fiction: For a New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Cultural Sociology* 14(2): 180-200.
- Walley, Christine J. 2013. *Exit Zero: Family and Class in Postindustrial Chicago*.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冯莹莹